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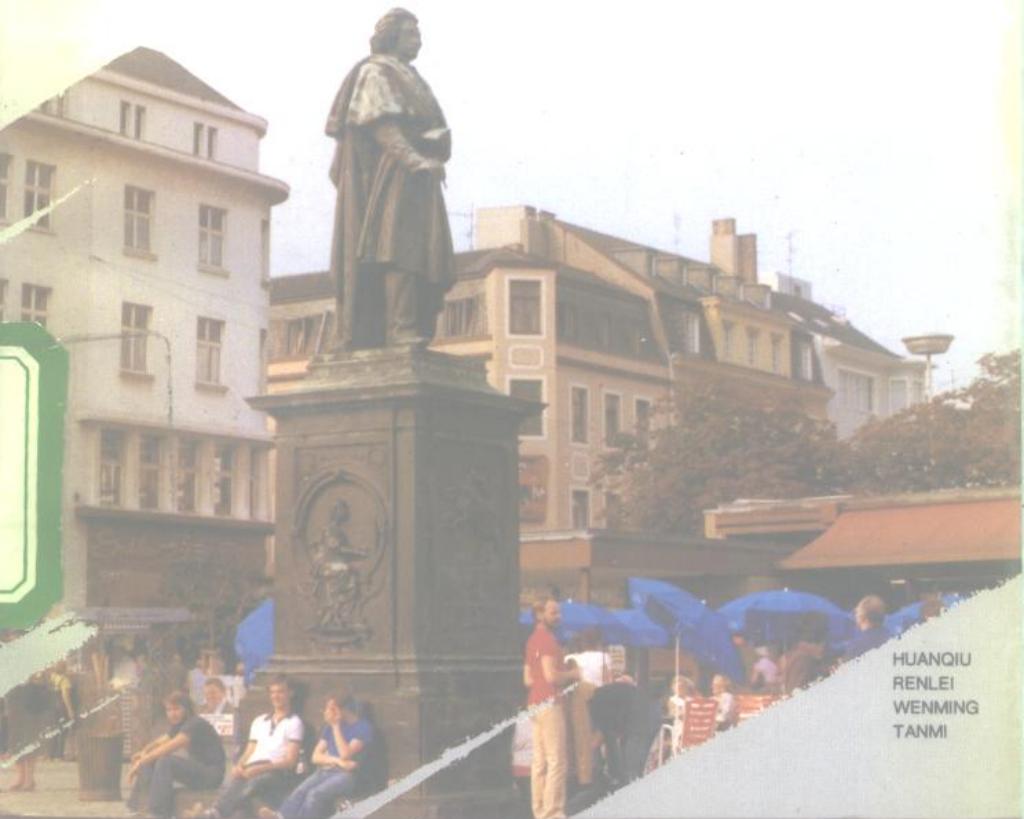
H.R.W.T



《环球人类文明探秘》丛书

德意志强悍之谜

王为民 张 晓 著



HUANQIU
RENLEI
WENMING
TANMI

德意志强悍之谜

王为民 张 晓 著

新登字(京)118号

书名：德意志强悍之谜

著者：王为民 张晓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白石桥路42号)
(邮政编码100081·电报挂号6550)

印刷者：昌平兴华印刷厂

发行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7

字数：147,000

版次：1994年5月第1版

印次：1996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11,001—18,000

书号：ISBN 7-5033-0432-4/G·09

定价：8.50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日耳曼人的血液中流淌着英雄史诗	(1)
第二章	日耳曼人不要教皇,要上帝	(10)
第三章	分裂割据:在磨难之中走向强悍	(36)
第四章	荣耀与耻辱:独具韵味的日耳曼文化	(64)
第五章	德意志——一个充满魅力的名字	(86)
第六章	俾斯麦:“让我们把德国扶上马!”	(105)
第七章	千年之梦——德意志人的世界蓝图	(143)
第八章	第三帝国民族意识的怪胎	(168)
第九章	走出夹缝:笑在最后的还是德意志人吗?	(186)
第十章	新世纪大门口:德意志人不甘徘徊	(207)

第一章 日耳曼人的血液中 流淌着英雄史诗

“……感谢罗马人对我的友谊，但如果这种友谊影响了我的权益，那我必须抛弃它，恺撒，你自己选择吧！”

——阿里奥维斯特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德意志民族留下一页既令人钦佩，又使人深感痛心。它在哲学、文学、音乐、艺术等领域不仅为自己而且为整个人类造就了一代代巨匠伟人，犹如灿烂群星，光辉夺目，而同时，它两度把自己和人类拖入战争，使世界饱尝了战乱之苦。歌德虽不是预言家，但他却以一个世界性伟人的眼光对德意志民族作出了自己的评判。“一想到德国人民，我不免常常黯然神伤，作为个人，他们个个可贵，作为整体，却又那么可怜，”“也许需要几个世纪，才能使高尚的精神

和高度的文化深入到我们同胞的心中……。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长期以来他们始终是处于野蛮和愚昧状态之中。”这一见解或许会促使人们去探讨一个培育了歌德、贝多芬、康德、黑格尔这些伟人的民族何以一再走上野蛮主义的强悍之路。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欧洲中部东自奥德—尼斯河、西至莱茵河、南起阿尔卑斯山、北抵北海、波罗的海沿岸的广阔地区，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曾处于外围和边缘地带。在中国、埃及、两河流域和印度古代文明蓬勃发展之时，这一地区却仍然处于野蛮状态，当它们早已进入高度发达的国家之后，这一地区的居民却仍然不知国家为何物。

生活在现今德国的居民通常被称为日耳曼人。但日耳曼人并不是德国土地上的最早居民。他们最初居住在德国的北部和西北部地区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南部。寒冷的气候、贫瘠的土地培育了他们旺盛的生存本能。为了生存，他们到处奔袭流窜，骚扰邻人，侵占土地，抢夺食物。无休无止的征战把整个日耳曼人造就成了英勇凶猛的战士。因而，当这些“长发披肩”、半裸身体的北方野蛮人携带着儿女及全部家当蜂拥南下之时，文明而发达、但却早已被日耳曼人的凶猛吓破了胆的凯尔特人不得不闻风而逃，节节退缩，或南逃，或西进，拱手让出自己世代居住的家园，甚至跨过莱茵河侵入罗马人所征服的高卢地区。凯尔特人在以武力从高卢人那里为自己争得一席立足之地的同时，又狐假虎威，以日耳曼人自称，借以恐吓高卢人，“日耳曼人”开始声名远扬，以致后来人们把德国土地上的居民统称为日耳曼人。

最初的日耳曼人是一群群四处流浪的游牧部落，但他们

却有着自己的信念与目标。正如舒伯特的《流浪者之歌》所说明的：

流浪，不断地流浪，带着血和泪，
仰问苍天：何处是我的归宿？
灵魂在我耳边暗告：
到你没有去过的地方，那儿有一切欢乐。

一路流浪，一路征战，日耳曼人就这样用血和泪书写着自己和他人的历史。战争和掠夺成为日耳曼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并对它产生了深刻影响，形成了其民族性格中好战的一面。日耳曼各部落中，最好战的当属苏维尔人。苏维尔人将其居住区分为 100 个区，各区每年选派 1000 人从军，其他男子则从事畜牧业和农耕，一年之后去替换先前从军入伍的男子。这种具有高度严密组织性的军事制度成为日耳曼人社会生活的典型特征。“日耳曼”这一名称本身就是指令人生畏的好战的战士。

这些好战的日耳曼人到公元前 2 世纪时对罗马人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并连败罗马军队。罗马人待机反击。而此时，四面出击、到处树敌的日耳曼人的贪婪又为罗马人提供了可乘之机。

公元前 1 世纪时，日耳曼人的领袖阿里奥维斯特已逐渐占领了莱茵河上游地区。此时，凯尔特部落的塞广尼人与本部落爱杜伊人鏖战正急，相持不下，于是前来求援。力图扩大地盘的阿里奥维斯特立即率军越过莱茵河，大败爱杜伊人。但战争结束后，他不但拒不退兵，反而要求塞广尼人割让 1/3 的耕

地，后又以征服者的姿态，要求他们纳贡并和爱杜伊人一起向他提供人质。势力强大的罗马人本已默认他的所作所为，甚至还授予他“国王”和“朋友”的称号，希望以此诱使他归顺。但阿里奥维斯特对此却不屑一顾。不久，他再次向塞广尼人提出了再让出1/3土地的要求。塞广尼人怒不可遏，爱杜伊人图谋复仇，于是又求到罗马人的门上。本来就对日耳曼人疑虑重重的罗马人面对他们的鸣冤叫屈与强烈不满，决心乘机教训一下日耳曼人。

公元前58年的一天，罗马统帅恺撒与日耳曼人的领袖阿里奥维斯特各自率领自己的军队在莱茵河以西一个叫米卢斯的地方进行了一次极不愉快的会见。在相互致意之后，恺撒盛气凌人地说：“记住，阿里奥维斯特！我和我们的元老院已经给了你一切特权，我们承认你为国王，接受你为罗马人民和国家的朋友，这是很少人能得到的荣誉。但是你要知道，爱杜伊人也是罗马的盟友。不要对他们发动战争。不要反对他们的盟邦。把他们的人质放回去。即使你不能说服你的部下退到莱茵河那边去，至少要保证不进高卢来。”

面对不可一世的恺撒，阿里奥维斯特毫不示弱。他装出一番颇为冤屈的样子，软硬兼施地说：“并不是我自己想越过莱茵河，是高卢人恳求我们来帮助他们的，为了他们，我和我的战士不得不弃乡离土！感谢罗马人对我的友谊，但如果这种友谊影响了我的权益，那我必须抛弃它。简单地说，如果你让我安安稳稳地行使权力，我将尽力帮助你赢得一切你想赢得的战争，如果你继续留在这块属于我的土地上，我将马上认为你是我的敌人！恺撒，你自己选择吧！”与此同时，他又命令自己的军队向罗马军队暗中靠近，并射击挑衅。恺撒不得不拨兵回

营。两天后，阿里奥维斯特又建议再次谈判，但当恺撒的两名使者前来之后，却又自食其言，以奸细之名将其投入狱中。

阿里奥维斯特的欺诈骄横与背信弃义促使恺撒以武力相见。在与罗马人的决战中，日耳曼人遭到惨败，其首领阿里奥维斯特落荒而逃，搭乘一条小船仓皇逃过莱茵河，保住了一条性命，而被他遗弃不管的两个妻子和妹妹却落入罗马人之手。莱茵河左岸的所有日尔曼部落（除亲罗马者外）均被赶回莱茵河右岸故地。近半个世纪之后，罗马人又以武力相见，经过约20余年的征战，统治了几乎所有的日耳曼人，并在乌比尔地区（今科隆）建立祭坛，以示对日尔曼人的胜利和统治。

日耳曼人被打败了，但却没有被征服，异族的统治与剥削激起了日耳曼人的坚决反抗。反抗运动的杰出领袖是阿尔米纽斯。在罗马人统治时期，他曾在罗马军队中服役，担任由日耳曼人组成的援军头目，屡立战功，并取得了罗马公民权，甚至获得了“罗马骑士”称号，但他却从未忘记自己是日耳曼人，始终把反抗罗马统治、解放日耳曼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为迷惑敌人，等待时机，阿尔米纽斯要求日耳曼人对罗马人服从恭顺，自己也对罗马驻军司令瓦鲁斯大献殷勤，赢得了罗马人的信任。公元9年秋，阿尔米纽斯将罗马军队骗进原始森林，并与其他日耳曼人一起将罗马军队团团围住，经过三天激战，几乎全歼敌军。瓦鲁斯自杀身亡，军官们被用来祭奠神灵，被俘的士兵不是被杀，就是被贬为奴。日耳曼人以此巨大胜利为契机，一鼓作气，清除了罗马人设立在日耳曼土地上的所有据点，把罗马人赶出了日耳曼人的土地。日耳曼人从此取得了对罗马人的独立。

频繁的掠夺征战，为日耳曼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民族性格

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烙印。日耳曼人早期的民主制度带有浓重的军事色彩，军事首领的权力越来越大，由下级军事首领组成的扈从队的权力也日益得到加强。为保护既得利益，军事首领们越来越倾向于从其自己的家庭中选择其继承人，选择制逐渐为世袭制所取代。在德国，这种制度有着自己的特点。出于掠夺土地和食物的需要，日耳曼人形成了对其首领的崇拜，把他看作是上帝的化身，并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他。他们发誓要忠于自己的首领，并严格遵守自己的誓言，从而产生了对首领的盲从。这种对领神的忠诚与服从随着岁月的变迁与历史的发展已深深地根植于日耳曼人的性格之中。

世袭制不仅存在于社会和军事领导阶层，在家庭当中也产生了世袭制。在清除了罗马人的统治之后，日耳曼人逐渐定居下来。最初，公有的土地是根据人口数量定期分配给大家庭耕种的，后来也演变为可以世袭的私有地。在世袭制下，长子拥有特权，而次子的处境则极为悲惨，只能得到很少份额的土地。他们朝思暮想的便是夺取他人土地为己所有。日耳曼人再次掀起对罗马人的战争、掠夺浪潮。这一浪潮恰与中国汉朝反击匈奴人入侵的斗争相巧合。被击溃的匈奴人大举西迁，于4世纪中叶进入欧洲，并打败了属于日耳曼部落的哥特人，从而引起了规模空前的、世界性的民族大迁移。日耳曼人及其他民族的入侵使西罗马帝国寿终正寝。

在对罗马人的征战掠夺中，日耳曼人结成了一些牢固的军事联盟，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法兰克人的联盟。它们与中欧这一广阔土地上的其他凯尔特—罗马居民和斯拉夫人一起构成了后来德意志民族的种族基础。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法兰克人于482年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法兰克王国经历了墨洛温

和卡洛林两个王朝，延续了 400 多年，是当时欧洲的一个大国。在墨洛温王朝时期，王国版图就已扩大到整个高卢和莱茵河以东的广大地区，此后，到卡洛林王朝时，王国版图在武力的支持下进一步扩大，到查理大帝时达到极盛时期。

768 年，查理和他的弟弟查理曼瓜分了由他父亲矮子丕平留下的法兰克王国。3 年后，查理曼去世，查理便将全部国土占为己有，查理曼的妻子和儿子被迫远逃他乡。查理是法兰克王国最有能耐的一位国王。他身材高大，性情乐观，但性格却专横急躁。他善于接受外来事物，对其他民族的文化尤其表现出浓厚兴趣。在他 40 岁时，还不顾旅途艰辛，策马行进万余英里来到被征服的意大利学习它的优秀文化。他甚至把意大利的核桃树和杏树移栽到自己的北方花园里。查理眼光远大，雄心勃勃，试图建立一个世界帝国，并在此梦想诱使下不断对四周的邻人开战，取得了节节胜利。为向东方扩展，查理不惜对萨克森人重兵征讨 30 余年，最终将它纳入法兰克的版图。随后，查理把萨克森与东法兰克、阿勒曼和巴伐利亚联合成为统一的国家联盟，为后来德意志民族和德意志国家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然而，法兰克王国的王权总的来说是不稳固的。它的第一任国王克洛维死后，国家便被他的四个儿子所瓜分，各自称王，各霸一方，相互厮杀。这一状况几乎贯穿了整个法兰克王国的历史，权力欲急剧膨胀的儿子们在其父尸骨未寒之际瓜分江山的局面屡见不鲜。在此过程中，日耳曼人忠诚与服从的局限性也不断表现出来。

日耳曼民族的忠诚服从与利己主义、个人主义恰似一对孪生兄弟。平民百姓多忠诚服从，中上层头目则忠诚与利己兼

具。他们具有忠诚的特点,但当他们的忠诚为自己赢得一些封土赏赐后,利己主义又会取代忠诚而占上风,极力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的权力欲和利己主义与统治者的权力欲和征服欲同步增长。为征服敌人或反叛者,统治者急需得到宫廷贵族和军事首领的支持,因而大施恩惠,赐予产业封地,而这些贵族与军事首领也借机与统治者讨价还价,壮大势力。墨洛温王朝时的克洛塔二世依靠贵族的支持征服了对手,统一了国家,却不得不与贵族分享统治权。这种分封的产业和封土到卡洛林王朝时逐渐制度化,作为采邑授予陪臣,但这些陪臣却随着势力的增强逐渐把这些采邑变为自己的世袭领地。查理大帝时,帝国被划分为伯爵领地,其最高行政长官是郡伯爵,他们享有最高审判权,负责上缴国王的税收和王室财产的管理以及士兵的招募。在帝国边疆地区,他还建立了边区伯爵领地,其地域要比郡伯爵领地大得多。边区伯爵的统治权力也具有更大的独立性,他们负责守卫边防,在战时可以自行征兵。贵族、陪臣领地的扩大,使作为王室权力基础的国王的大地盘大为减少,王权的地位自然难以稳固。

自克洛维国王死后开始的瓜分江山的作法在权力欲与利己主义的作用下一直延续到9世纪。查理大帝的继承人虔诚者路德维希在继位仅3个年头之后,即把国土分给自己的三个儿子:洛塔尔(副皇,意大利国王)、日耳曼路德维希(巴伐利亚国王)和丕平(阿奎丹尼亚国王)。后来,他又想给自己第二次婚姻所生的儿子查理(秃头查理)争取一份国土,却遭到其他儿子的反对。虔诚者路德维希于840年去世时,皇位继承人洛塔尔还远在意大利,其他几个儿子借机扩大地盘。日耳曼路德维希占有了东法兰克,秃头查理占有了西法兰克,并于次年

联合打败了皇帝洛塔尔。842年，路德维希和查理在斯特拉斯堡会晤，结成秘密同盟，其结盟誓约被称为“斯特拉斯堡密约。”为使各自的士兵都能听懂，这一誓约是用罗曼语和德意志语两种语言宣读的。东西法兰克的语言发生分裂，斯特拉斯堡誓约也成为现存的最古老的德语文献。

843年，虔诚者路德维希的三个儿子（丕平已死）在凡尔登签订条约，再次瓜分了帝国：莱茵河以东地区归属日耳曼路德维希，称为东法兰克王国，后来演变为德国；秃头查理占有西法兰克王国，此即法国的前身；中法兰克王国划归皇帝洛塔尔，后来，其北部又被东西法兰克瓜分，南部则演变为意大利。东法兰克王国后来又被路德维希的三个儿子瓜分。胖子查理虽一度统一国家，但王权却未能恢复，最后在贵族骚动中被废黜，王位落入他人之手。本来就已不稳固的王权面对匈牙利人的入侵更显脆弱，无力抵挡。日耳曼人奋起自救，抗御外敌，贵族便借机壮大势力，扩大地盘，于是产生了一系列具有国家性质的公国。911年，各公国推举康德拉一世为国王，建立了德意志王国。德意志的历史从此开始。

“德意志”一词最早出现于786年，意指人民的、民间的、通俗的语言，是与罗曼语（拉丁化的西法兰克方言）相对而言的。9世纪中叶，这一词逐渐用来指使用这一语言的居民，11世纪时，具体说是从1079年起，被用来指德意志国家和人民。

第二章 日耳曼人不要教皇，要上帝

“信徒和上帝，犹如两个相爱的恋人，他们之间
不需要第三者了。”

——马丁·路德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当伟大的马克思用这一生动形象的比喻向世人无情地揭露宗教的罪恶时，他的心情一定非常激动。他对基督教给德意志人民所带来的深重灾难也一定深有感触。在中世纪长达千年的历史中，基督教成为德意志人食而不得下咽的一颗苦果，德意志社会一片黑暗反动，德意志人民也处于麻木愚昧之中，以致于一位教皇把当时的德国称为“顺服之土”。幸而有些有识之士力图拨开四处弥漫的低沉乌云，才使德意志人无愧于他们的名字。

基督教产生于公元1世纪。世界历史的“公元前”与“公元后”之分即以耶稣基督的诞生为标准。基督教对西方（包括德国）乃至世界都有着巨大影响。

德意志人(日耳曼人)接触基督教已是该教产生几百年之后的事了。他们是通过与罗马人的接触才逐渐认识、接受基督教的。

最初,基督教受到罗马人的保护,但不久,仇视基督教的犹太人就使基督教的处境发生逆转。基督徒到处受到怀疑、排斥,甚至发展到只要表白信仰基督教就有遭受刑罚的可能。只是到了公元3世纪,基督教才再次受到罗马法律的保护,其势力也得到迅速发展。

罗马统治者君士坦丁最初并不信仰基督教,但对基督徒却颇有好感。在他为取得罗马统治权而与对手进行的力量悬殊的斗争中,他希望基督徒的上帝慷慨相助。决战前夜,君士坦丁梦中见到了基督姓名中第一个字母的缩写“P”以及“以此符号制胜”的字样,便立即在自己的头盔和士兵的盾牌上画上了这一标记。在战斗中,君士坦丁获胜,对手则命归西天。他相信,这是基督徒的上帝暗中相助,十分感激,并把帝国的首都从罗马迁到了基督教影响最大的拜占廷,称为新罗马,世人称为君士坦丁堡以示纪念。帝都东迁使主教们所在的罗马更为引人注目。

随着罗马人与日耳曼人军事冲突和正常交往的增加,基督教逐渐在日耳曼人中间传播开来。在这一进程中,战俘和商人起了积极作用。克洛维建立法兰克王国10余年之后,宣布信奉基督教。在496年的基督诞生日,克洛维率领3000名法兰克人接受了规模空前壮观的洗礼。基督教正式迈入日耳曼人的生活。

皈依基督教使克洛维受益匪浅。王国有了统一的精神支柱,被征服的原罗马帝国的臣民的不满与怨气也大为减弱,原

罗马帝国的主教们也站到了他的一边。正是借基督教这一精神力量(当然还有暴力),克洛维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把势力扩大到现今的几乎全部法国、莱茵河流域和从阿尔卑斯山直到德国中部山脉之间的广大地区。克洛维知恩报德,积极支持基督教,教会也从王室、贵族的手中得到大量的慷慨馈赠,成为法兰克王国内最大的封建领主。

克洛维家族的墨洛温王朝衰落后,卡洛林家族的矮子丕平权力日益加强,并与罗马天主教会结成同盟,由大主教卜尼法斯为他涂香油膏,加冕称王,墨洛温王朝的末代国王则被贬入修道院之中。当罗马教廷遭到意大利伦巴德人的威胁时,教皇又亲自前往巴黎面见丕平,授予“罗马贵族”称号,赋予保护罗马和教廷的责任。并再次为他以及他的两个儿子涂香油膏,同时禁止法兰克人在任何时候选举其他家族的人为国王,否则将予以惩罚。矮子丕平则两次出兵征讨教皇的敌人,建立“教皇国”,使教皇拥有了世俗君主权,直至1870年。

对基督教的利用也使具有非凡军事天才的查理大帝在扩大版图、增强威望过程中如虎添翼。为征服萨克森,查理大帝以基督的名义,一次竟杀戮4500名萨克森人,并用沾满鲜血的刀剑,把基督教强行推广到萨克森人的土地上。公元800年的冬天,教皇列奥三世与罗马贵族发生了尖锐冲突。查理应邀进军罗马,打败了教皇的敌人。教皇对他感激涕零,决定在圣彼得教堂为他举行圣诞庆祝会。圣诞节时,当查理在教堂作完礼拜站起身时,教皇突然将一顶耀眼夺目的金色皇冠戴在这位头发已经花白的法兰克国王头上。查理毫无思想准备,被搞得手足无措,说不出一句话来,而事先隐藏起来的罗马骑士们则高声欢呼“庄严的罗马皇帝万岁!”

查理对教皇加冕这一形式略有不快。这不仅意味着他必须为教皇服务，而且也显示出教会权力处在世俗权力之上，皇权应由教权来支配。这就埋下了后来皇权与教权斗争的种子。

查理对由教皇加冕这一形式虽有不满，但对这一头衔却颇有兴趣。因而他甚至要求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承认他为享有同等权力的皇帝。

在日耳曼人的历史上，极力扩大地盘与势力的诸侯不断对王权提出挑战，但反过来讲，他们又似乎是不断对外扩张、征服的王权的缩影，加之德国地处中欧，又没有赖以御敌的天然边界，不断遭到异族入侵，就使日耳曼人产生了一种不安全感。他们所追求的就是不断把边界向前推进，扩充势力，甚至想统治世界。以前，他们只有暴力这一物质手段，在他们接受了基督教后，就使他们拥有了威力巨大的精神武器。再加上这些统治者又是由上帝的代言人教皇加冕的，又使他们可以以上帝的使者自居，从而为自己的对外扩张找到了宗教借口。在此后的 500 余年中，所有的德国统治者都以教皇为查理加冕来为自己的野心辩护。

德意志国家产生后，教会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更显重要。到奥托一世时，由于在他上台后不久即遭到势力不断强大的公爵们的反抗，外敌也借机侵扰，因而便着手刻意培植教会势力。他把大量的王室产业赠给主教和修道院长，并授予管理权、征兵权、司法权和铸币权等，使教会辖区取得了与世俗伯爵统治区同样的地位。主教们与一心想扩大其世袭领地的世俗诸侯不同，他们不能结婚，没有后代，加上国王有权任命主教，从而排除了王权旁落的危险，使王权建立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之上。教会权力成为世俗权力的平衡力量。